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 秦直道

主编  
王子今

QIN  
ZHI  
DAO

## 秦直道 与汉匈战争

宋超 孙家洲 著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 秦直道

主编  
王子今

QIN

ZHI

DAO

## 秦直道 与汉匈战争

宋 超 孙家洲 著

图书代号：SK18N0270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直道与汉匈战争 / 宋超, 孙家洲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8.6

(秦直道 / 王子今主编)

ISBN 978-7-5613-9848-7

I. ①秦… II. ①宋… ②孙… III. ①古道—研究—陕西—秦代 ②匈奴—战争史—研究—中国—秦汉时代  
IV. ① K928.78 ②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5930 号

## 秦直道与汉匈战争

QIN ZHIDAO YU HAN-XIONG ZHANZHENG

宋超 孙家洲 著

选题策划 / 刘东风 侯海英

责任编辑 / 杜莎莎 赵荣芳

责任校对 / 谢勇蝶 张姣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政编码 710062)

网 址 /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 重庆新金雅迪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1.25

插 页 / 2

字 数 / 280 千

版 次 /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13-9848-7

定 价 / 230.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029) 85303879

## “秦直道”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王子今

编	委：	王子今	辛德勇	张廷皓	吴宏岐
		徐卫民	孙家洲	宋超	焦南峰
		张在明	徐君峰	马啸	孙闻博
		高彦平	刘东风	侯海英	

# 总 序

司马迁撰著《史记》，完成了被翦伯赞称作“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sup>①</sup>的史学经典。徐浩说，《史记》“纵贯上下数千年，横及各国各阶层，举凡人类全体之活动，靡不备载”，又“叙述社会中各种现象”，并且“反春秋时代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之狭小眼光，为匈奴等民族作列传”。<sup>②</sup>李长之也曾经肯定《史记》的文化贡献，他指出，司马迁“是要在人类的生活经验之中而寻出若干范畴来”。<sup>③</sup>朱希祖也说，《史记》避免了一般史书“不载民事”“未睹社会之全体”的痼病，能够“大抵详察社会，精言民事”。<sup>④</sup>《史记》超越了中国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撰述范式，给予历史整体特别是物质生产史、物质生活史以及下层社会的生存境况与心理体验相当多的关切。我们还注意到，对于交通史的关心和记述，也是司马迁《史记》“高气绝识”<sup>⑤</sup>、“雄

①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2卷，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656页。

② 徐浩：《廿五史论纲》，人民文学出版社1949年版，第42—43页。

③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238—240页。

④ 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第71—72页。

⑤ 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一二“著书百二十篇”条，明刻本。

视千古”<sup>①</sup>、“卓识远见”、“立意深长”<sup>②</sup>的表现之一。秦人重视交通的史迹，在司马迁笔下成为可以使历史观察者聚焦的显著现象。秦始皇兼并天下之后，辛苦巡行，又大举启动交通建设，形成了以驰道联结全国，各个地区各能通达，重要地点皆得“毕至”<sup>③</sup>的规模宏大而交通效能亦达到很高水准的交通网。秦王朝统治时期，是中国交通事业取得显著进步的重要历史阶段，而秦始皇执政后期规划发起的直道工程，更在中国古代交通史册上书写了极辉煌的一页。

司马迁在自己的史学著述中保留了对秦始皇直道的珍贵的历史记忆。《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写道：“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凿山堙谷，直通之。”<sup>④</sup>又《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sup>⑤</sup>秦始皇去世，秘不发丧，车队经直道返回咸阳，“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sup>⑥</sup>。“鲍鱼车返，龙祖仙游”<sup>⑦</sup>，直道的规划者最终以极其特殊的方式经行这条道路。直道于是也成为秦帝国最高权力由“始皇帝”向“二世皇帝”交递过程的象征性符号。《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记载：“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

① 黄震：《黄氏日抄》卷四七《读史二·汉书·司马迁》，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汪佩鄂刊本。

② 陈子龙：《史记测议·序》，聚锦堂刻本。

③ 汉文帝时，贾山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称《至言》，其中写道：“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瀚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见《汉书》卷五一《贾山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28页。

④ 《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22页。

⑤ 《史记》，第902页。

⑥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333页。

⑦ 彭孙贻：《烛影摇红·汶上感怀》，见《茗斋集》卷一五《诗余附》，《四部丛刊续编》景写本。

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sup>①</sup>明确指出了直道对于“击胡”即抗击北方草原强势民族之军事战略的特殊意义。

在秦代服务于全国政治军事总格局的交通规划中，直道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为直道”到三十七年（前210年）载运秦始皇尸身的车队“行从直道至咸阳”，直道修筑大致只有两年的时间。虽然有“道未就”的说法<sup>②</sup>，但是显然已经具备可以通行帝王乘舆的规格。直道工程量非常浩巨而工期短暂，体现了秦帝国超高等级的行政效率。秦直道，可以看作秦政的纪念。

司马迁是著名的重视实地考察、喜爱游历的史学家。王国维说：“是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sup>③</sup>在《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篇末，司马迁记录了亲身行历直道的体验：“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sup>④</sup>我们今天行走在秦直道遗存之宽广坚实的路面上，都会想到司马迁“吾适北边，自直道归”的经历以及“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的深沉感叹。脚踏路草黄尘，感受太史公当年的步履，可以体会史家名言的亲切。而天风林籁，也响应着古今的共鸣。如果没有司马迁对于秦始皇直道的高度关注、亲身踏察与具体记述，也许后世人们对这条堪称伟大工程之卓越成品的古代道路会长期处于无知境界，心持冷漠态度。司马迁之后二千余年，我们基本没有看到对秦直道予以特别关注的文史论著。正史所谓“直道”，含义往往已经大为不同。如《汉书》“直

<sup>①</sup> “通直道”，司马贞《索隐》：“苏林云：‘去长安八千里，正南北相直道也。’”《史记》，第3468—3469页。

<sup>②</sup> 《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第3097页。

<sup>③</sup>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见《观堂集林》卷一一，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9月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第4页。

<sup>④</sup> 《史记》，第3100页。

道行”<sup>①</sup>，“直道而行”<sup>②</sup>，“直道而不曲”<sup>③</sup>，“直道”已经是另外的含义。《汉书》卷九一《货殖传》：“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颜师古解释说：“直道而行，谓以德礼率下，不饰伪也。”<sup>④</sup>此所谓“直道”言政治道德、政治道理、政治道行、政治道义，其实已经与交通道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后世虽然也有称作“直道”的交通工程，如《魏书》卷二《太祖纪》：“车驾将北还，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sup>⑤</sup>但是这样的“直道”，其工程规模、文化作用和历史影响，已经完全不能与秦始皇直道相比。

对秦始皇直道的科学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始。内蒙古自治区的考古学者对秦始皇直道北段进行了实地调查。史念海先生的历史地理学名作《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宣示秦直道研究的学术路径正式开启。此后，许多学者开始关心这一学术主题。历史地理学研究者和交通史志研究者结合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学术成果。陕西、甘肃、内蒙古的考古学家和许多珍视并致力于保护古代文化遗存的人文学者分别进行了多次秦直道遗迹的艰苦调查。靳之林、王开、徐君峰等先生坚持数年的秦直道考察，为秦直道研究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第一手资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在明教授主持的秦直道发掘，获得了重要成果。他在陕西富县进行的发掘，列名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民间热爱中国历史文化、关注秦始皇直道的人们，也曾经发起多种形式的对于秦直道保护和考察极有意义的活动。如“善行天下”公益徒步活动组

① 《汉书》卷八一《孔光传》，第3356页。

② 《汉书》卷五《景帝纪》，第153页；《汉书》卷七七《盖宽饶传》，第3247页；《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4194页。

③ 《汉书》卷三六《刘向传》，第1947页。《后汉书》卷五一《庞参传》：“竭忠尽节，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群邪之间，自处中伤之地。”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91页。

④ 《汉书》，第3680页。

⑤ 《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页。



委会策划并实践的多次对秦始皇直道北段的徒步考察，以及史军、刘敬伟、于恬恬、荣浪2014年9月至10月自淳化至包头对秦始皇直道全程的徒步考察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的朋友们，特别是刘东风社长、侯海英女士为推进秦始皇直道的研究精心策划，精心操作，推促学界朋友合力完成了这套“秦直道”丛书。对于有识见的出版家的这一功德事，秦史研究者、历史地理研究者、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者，以及所有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的朋友都会由衷感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组织的秦直道遗迹考察（2013年8月7日至17日），集合了数十名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行历陕西淳化、旬邑—甘肃正宁、宁县—陕西黄陵、富县、甘泉，取得了诸多收获。这样的工作，也成为“秦直道”丛书编撰的重要的学术基础之一。

“秦直道”丛书包括徐卫民、喻鹏涛著《直道与长城——秦的两大军事工程》，徐君峰著《秦直道道路走向与文化影响》，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著《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徐君峰著《秦直道考察行纪》，王子今著《秦始皇直道考察与研究》，宋超、孙家洲著《秦直道与汉匈战争》，马啸、雷兴鹤、吴宏岐编著《秦直道线路与沿线遗存》，孙闻博编《秦直道研究论集》。丛书编写的学术构想，不强求作者学术意见的简单一致。可以看到，不同的学术见解，例如对于所谓“东线说”和“西线说”的不同认识，分别呈示于作者们各自的论著中。我们愿意学习当年《古史辨》的编者以宏大胸怀同时发布相互对立的学术观点的做法，以方便读者一览学术全局，明了学术流变，自主学术分析，产生学术判断，形成学术新知。应当说明，尽管若干学术意见不一，但是对学术规范的信守，对科学真知的追求，对实证原则的遵循，是“秦直道”丛书作者们共同的理念。

相信随着今后秦直道研究工作的进展，特别是秦直道考古工作

新收获的取得，一些学术疑问能够得以澄清，若干学术共识应当可以逐步达成。

“秦直道”丛书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2年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史念海先生生长在陕西师范大学工作。“秦直道”丛书今天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推出，也许符合史先生的心愿。

“秦直道”丛书郑重面世，可以看作对史念海先生的一种纪念。

在以“秦直道”丛书献呈史念海先生灵前的时候，作为学生、晚辈和学术追随者，我谨再次诚挚地向这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导师、秦始皇直道研究的先行者衷心致敬！

王子今

2017年3月15日于北京大有北里

# 前 言

公元前三四世纪，战国七雄为争夺霸权苦斗不休，而一个强悍的游牧民族——匈奴却趁势在大漠南北崛起，对北边与匈奴毗邻的秦、赵、燕三国均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游牧民族所特有的突袭的作战方式，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与突然性，致使防御匈奴突袭变得极其困难。构筑起永久性的防御工事，则是有效地防御匈奴骑兵突袭的可行方式。秦、赵、燕三国相继修建长城，以抵御来自北方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的侵扰。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了缓解来自北境匈奴方面的军事压力，于三十三年（前214年）命内史蒙恬统率三十万大军北逐匈奴，将匈奴逐出毗邻帝国都城咸阳所在内史地区的河南地，建置郡县，徙民实边，修筑长城。三十五年（前212年），秦始皇为了有效地沟通九原郡与都城咸阳的联系，又命蒙恬主持监建工程浩大的北起今内蒙古包头，南至今陕西淳化的一条南北长达七百多公里的重要军事通道——秦直道。由于这条道路大体南北相直，故称作“直道”。从三十三年蒙恬于河南地置郡县，筑“河上”长城，到三十五年修筑沟通九原边郡与中央王朝联系的直道，正体现出秦始皇在指挥蒙恬经营河南地时的战略远见与缜密规划。秦长城与秦直道这一横一

纵两大军事工程的修筑，标志着秦帝国在北部边境已经构筑起一道抵御匈奴南下的坚固防线，不仅改变了自战国以来，匈奴在北境，特别是在河南地极为活跃的态势，也为其后汉朝依托秦长城，通过秦直道反击匈奴奠定了基础。

然而，史料中关于秦直道记载之匮乏，与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符。曾随从汉武帝行历秦直道全程的司马迁，虽然记录了直道的起点与终点，但在汉初盛行一时的“过秦”视野之下，除了感叹直道工程浩大，就是指斥蒙恬轻蔑民力，助始皇为虐云云，却没有提及行经直道的任何一个地点，这为后人研究直道的具体走向留下不尽遗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关于直道走向的争论与此不无关系，直道走向几乎成为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1975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发表了《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一文，认为秦直道由陕西淳化县北梁武帝村秦林光宫遗址北行，至子午岭上，循子午岭主脉北行，直到定边县南，再由此东北行，进入鄂尔多斯草原，在昭君坟附近渡过黄河，最终到达包头市西南秦九原郡治所。史先生的研究首次勾画了秦直道的具体走向，将秦直道的研究引向高潮。1984年5月，长期在延安体验生活的著名画家靳之林先生对秦直道进行全程徒步考察，首次勾勒出与史念海先生认定的“直道”不同的路线：秦直道始于陕西淳化县梁武帝村，经旬邑、黄陵、富县、甘泉、志丹、安塞、榆林一直向北延伸直达内蒙古包头西。这条“直道”的路线由于较史先生所认定的“直道”偏东，可视为秦直道东线说的代表。

从现在学界研究的成果看，关于秦直道南北端的起讫点没有争议：南端起于今陕西省淳化县北梁武帝村的秦林光宫，北端终于秦九原郡故治今包头市昆区南郊的麻池古城。但是，关于秦直道中段的路线却分歧甚大，形成所谓秦直道东西两线说。所谓“西线”是指史念海先生1975年复原的直道路线；“东线”是指靳之林、王开等学者20世纪80年代所复原的直道路线。虽然现在关于秦直道的

走向，西线说与东线说相持不下，但随着长期以来直道考察工作的不断深入与考察资料的陆续刊布，秦直道东线说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同。本书主要是持秦直道东线说。

秦直道基本筑就之时，秦与匈奴关系又发生重大变化。秦二世夺位后，蒙恬被迫自杀，秦人经营多年的北境防御体系崩溃，匈奴趁机重夺河南地。公元前202年，汉王刘邦在洛阳称帝，随后迁都长安，活动于河南并控制秦直道北端的匈奴对关中及都城长安的威胁，立即就凸现出来。

汉高祖刘邦在汉匈首次战争——平城之战失利后，于高祖九年（前198年）采纳刘敬的建议，与匈奴缔结和亲之约。刘敬奉命出使，除了以“公主”嫁与单于，厚赠奩资，主要的条款有三项：一是每年都要奉送一定数量的金、絮、缯、酒、米等物品；二是汉朝开放关市，准许汉匈双方物资交流；三是约为兄弟，以长城为界，互不侵犯。此后终高祖之世，中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直至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发动对匈奴战争时止，和亲是汉廷对匈奴的最基本的一项政策，一直实行了六十多年。从刘敬出使匈奴后向刘邦报告活动于河南的匈奴白羊、楼烦王部的情况看，刘敬出使匈奴时很可能经过秦直道的某些路段，因此对河南地的匈奴情况比较了解。如果这一推测不误的话，刘敬应是第一位经过秦直道出使匈奴的汉朝使者。

文帝时期，汉匈关系再度呈现紧张态势。文帝三年（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部入侵河南地，汉文帝初次亲临秦直道的南端起点甘泉宫，部署反击匈奴事宜。匈奴退兵之后，汉文帝从甘泉前往高奴（今陕西延安），终至太原，有可能行经直道的部分路段。而发生在文帝十四年（前166年）的匈奴入侵事件，则是匈奴出动兵力最多、入侵程度最为严重的一次。匈奴老上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匈奴侯骑竟然快速深入雍县（今陕西凤翔南）与甘泉宫，似乎不能排除利用直道南端某些路段进逼甘泉宫的可能。

匈奴右贤王部所面对的河南地正是秦直道的北端起点；而活动于河南地的匈奴白羊、楼烦王诸部为右贤王所辖，他们控制着秦直道的北段大部分路段，“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成为匈奴威胁西汉京畿地区安全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匈奴通过秦直道，在河南地屡次发动大规模侵扰的行为，促使深受其害的汉廷君臣不得不重新考虑防御匈奴的策略，而秦人对待匈奴的一些具体措施，特别是蒙恬对河南地的经营，成为汉人效法的蓝本。汉武帝决策反击匈奴后，对抗击匈奴具有决定意义的首次战役，就是围绕着河南地的争夺展开的。

景帝时期，汉匈关系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虽然边境偶有匈奴小规模侵扰，但像文帝时期那样大规模入侵内地的现象再没有出现。武帝即位之初，继续与匈奴和亲，北境之上出现了一段短暂的和平时期。但是，汉匈之间经过长达六七十年的战争与冲突积累下来的宿怨，绝非恢复“明和亲约束”就能够化解的。凭借“文景之治”积蓄下来的巨额财富，以及吴楚之乱平定后形成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汉匈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变化，以元光二年（前133年）马邑之战为标志，汉匈战争终于全面爆发。

元光二年汉军马邑伏击匈奴失败后，匈奴军臣单于汲取因深入塞内而几乎全军覆灭的教训，重施在北边郡进行骚扰掠夺之故技，不再给汉军设伏围歼的机会。在这种形势下，汉武帝重新筹划抗击匈奴的策略，将目光转移至尚在匈奴白羊、楼烦王控制下的河南地。元朔二年（前127年），车骑将军卫青等击逐匈奴楼烦、白羊王，夺取河南地。汉武帝采纳谋士主父偃的建议，在秦原九原郡分置朔方（治朔方，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与五原（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二郡，重新修缮秦时所筑长城，同时从内地徙民十多万入充实朔方。至此，秦直道全程再度为汉廷所控制，重新成为沟通边郡与朝廷联系的通道。

元封元年（前110年）冬十月，汉武帝平定南越后，亲率大军，

自秦直道南端起点云阳出发，“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此次武帝巡行北边，往返均取道于直道以求便捷，为三个月后再次出巡做准备。而元封元年春正月武帝的出巡，当是武帝诸多出巡中历时最久、行程最远的一次出巡，史载汉武帝“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周万八千里云”。司马迁所谓“吾适北边，自直道归”云云，是史料中最为明确的关于汉武帝由五原经直道返回甘泉宫的记载。

太初三年（前102年），为了强化秦直道的防御力量，汉武帝使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塞筑“光禄城”，将五原郡的防线再向正北推出数十里或数百里之遥。为报复汉筑塞外列城的军事行动，匈奴也数次突入五原郡等北边郡，“行坏光禄所筑亭障”。而汉军则通过秦直道征调兵力，出五原郡抗击匈奴。征和三年（前90年）三月，武帝晚年最后一次大规模出兵中，贰师将军李广利就是率大军出五原郡击匈奴的。是役之后，汉匈双方围绕直道北端起点五原的争夺基本告一段落。直至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匈奴三千余骑侵入五原，这是史书所见匈奴最后一次大规模侵扰五原郡，自此之后匈奴“希复犯塞”。

西汉年间，汉军最后一次出五原的军事行动发生于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春。汉宣帝遣五路汉军与乌孙共攻匈奴。五路汉军中，虎牙将军田顺将三万余骑出五原，祁连将军田广明将四万余骑出西河。西河与五原均位于直道北部的通道之上，且是役征发的主力是“关东精锐士”，“五将军师发长安”，因此不能排除，至少出五原的三万余骑与出西河的四万余骑，可能经由直道或直道部分路段出塞击匈奴。

从上述汉匈围绕五原郡的反复争夺，不难看出双方对直道北端起点五原郡的重视程度。汉军以五原郡为出发地，显然不是地广人稀又饱经战事的边郡所能独力支持的，其中许多军事行动应是通过直道来完成军队调动及物资运输的。

本始三年，汉与乌孙联合出击匈奴，在汉匈战争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经过是役的打击，匈奴加速衰败，又因匈奴最高统治层争夺单于之位发生分裂，开启了宣帝五凤年间匈奴争夺单于位之内讧。五凤四年（前54年），呼韩邪单于在其兄郅支单于的压迫下，被迫再次放弃单于庭南撤。为了与郅支单于相抗衡，呼韩邪单于决计附汉。

甘露三年（前51年）春正月，呼韩邪单于由五原郡入塞，经秦直道至甘泉宫朝见汉宣帝，受到汉宣帝隆重接待，表明汉朝正式承认呼韩邪单于为匈奴族最高首领，确立了匈奴隶属于汉朝的政治关系。甘露三年二月，呼韩邪单于回归匈奴后，主要是在临近五原郡的塞外活动，希冀在事态紧急时，通过秦直道沟通与朝廷的联系。黄龙元年（前49年）春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二次来朝，同样是由五原入塞，经秦直道至甘泉宫朝见汉宣帝；于同年二月到漠南，仍然留居于光禄塞下，依托汉塞防备郅支单于。

元帝即位后，呼韩邪单于继续得到汉朝的全力支持。建昭三年（前36年），代理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奉命出使西域，矫制征发西域诸国兵及汉军四万多人，远征康居，最后击杀郅支单于。此役是西汉年间对匈奴的最后一战，与汉廷敌对的匈奴残余势力从西域被清除。

郅支单于败亡之后，呼韩邪单于上书元帝“愿入朝见”。公元前33年春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由五原入塞，经秦直道至长安朝见汉元帝。在长安期间，呼韩邪单于表示“愿媾汉氏以自亲”，元帝遂将王昭君赐予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号王昭君为“宁胡阏氏”。元帝为了庆祝诛灭郅支单于以及呼韩邪单于来朝，汉匈不再以兵革相见，边境从此永远安宁，改元“竟宁”，以志纪念。通过已筑就一百多年的直道的沟通，汉匈民族终于摆脱“胡笳互动，牧马悲鸣”的境地，迎来一个“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的时代，而遗存至今的直道，正是这段历史默默无语的见证者。



自匈奴呼韩邪单于在宣元年间归附汉朝，汉元帝遣王昭君出塞和亲之后，汉匈之间一直保持着和平相处的友好关系。呼韩邪单于死后，每位新单于继位，都要遣名王入朝贡献或遣子入侍，这已成为汉匈和平交往的惯例。成帝河平四年（前25年），复株累若鞮单于朝正月，是为匈奴第二位朝汉的单于。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正月，匈奴乌珠留单于与乌孙大昆弥伊秩靡同至长安朝贺正月。匈奴与乌孙的首领同时入朝，这在西汉历史上是仅有的一次。

两汉之际，汉匈关系再度发生巨变。王莽代汉建新后，急于消弭汉朝对匈奴周边民族之影响，树立新朝威信，派遣大批五威将军为使者，周游四边，宣扬新朝奉天代汉的符命，收缴汉朝颁行的印绶，更以新室的印绶。新朝使者至西域后，一律贬原西域诸“王”为“侯”；而至单于庭的新朝使者，则更改汉印文“单于玺”为“单于章”。这种无端贬低匈奴与西域诸国地位的举动，激起匈奴与西域诸国强烈不满。匈奴乌珠留单于遣数万骑勒兵朔方塞下，向王莽示威。王莽更急于立威匈奴，于始建国二年（10年）募卒三十万，准备十道并出兵逐匈奴，甚至预分匈奴土地人民为十五份，企图立呼韩邪子孙十五人为单于。乌珠留单于则针锋相对，出兵侵扰北边，大肆杀掠。至此，“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边地，再次沦为汉匈两大民族厮杀的战场，史称“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

东汉初年的汉匈关系，与西汉初年极为相似。匈奴趁两汉战乱之机坐大势力，不仅重占西域，而且联合北边割据势力彭宠、卢芳等及乌桓大肆侵扰北境，五原郡再度成为汉匈双方争夺的重点之一。不过这种动荡局势并没有持续许久，因为匈奴内部再次发生分裂。建武二十四年（48年）正月，漠南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以比祖父呼韩邪单于附汉得安，故而沿袭其号，以示与汉和好之意；单于比甚至仿效呼韩邪单于通过秦直道朝汉故事，亲至五原塞外，表示要“永为蕃蔽，扞御北虏（指北匈奴）”。